

光焰不熄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周质平◎著



胡适一生的工作和努力是和中国前途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将“中国”这个成分从“胡适”这个名词中抽离，“胡适”立即成了一个虚幻。胡适的功也好，过也好，唯有在“中国”这个大前提之下，才有意义。

——周质平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光焰不熄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周质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焰不熄 / 周质平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08-1490-7

I. ①光… II. ①周… III. ①知识分子—人物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4711号

光焰不熄

作 者 周质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90-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占有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20 世纪上半叶，胡适与鲁迅、冯友兰、林语堂、吴稚晖、赵元任、梁漱溟、钱玄同等学人，在学术路径的取舍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领域。胡适作为当时“暴得大名”的学者，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与鲁迅、冯友兰、梁漱溟等人究竟有哪些异同，一直是学界普遍关注但至今未有定论的问题。

周质平先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多年来致力于胡适思想的研究及胡适著述的整理工作，是海内外公认的研究胡适的权威学者。在本书中，作者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书以《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为名曾于 2002 年在中国大陆出版，此次增订本书，丰富了内容，同时，在篇目选择上，我们做了重新编排，收录了之前未曾在大陆发表过的文章，计 10 余万字。本书所收个别文章写作时间较早，世易时移，仅代表作者当时的一家之言，为了便于参考研究，内容仍然保留全貌。

九州出版社
2012 年 5 月

增订版自序

光焰不熄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写《南海康先生传》，首论“时势与人物”。他对“人物”一词的界定是“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之前，与既出现之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①用这个标准来评量胡适的一生，胡适无疑地是个“人物”。

胡适在1917年回到中国，提倡白话文，批判旧传统，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史》，《红楼梦考证》等，为现代中国学术树立了典范。对孝道，丧礼，妇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响从学术研究到日常生活，及于各个层面。真可以说是“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套句《象山学案》中的话，“天地间有个胡适之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②是一点不夸张的。

梁启超在《时势与人物》中，将人物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两类：“应时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若以这几句话来描述胡适回国之后10年之间，在中国之际遇，大致是不错的。论者往往以“暴得大名”四字来刻画胡适初回国时骤享大名，披靡一时的情况。这和梁启超所论述“应时之人物”，若合符节。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之6，页58。《饮冰室合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象山学案》中的原文是：“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原是一句反问，但胡适在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1935，共10册），《建设理论集》的《导论》（页17）中，引用时，却作肯定句。参看，《宋元学案》（台北：商务，1988，页354）。

对于“先时之人物”，梁启超的说法是“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用这几句话来说明1949年到1979年，30年之间，胡适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批判、诬蔑、歪曲和侮辱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举国欲杀，千夫唾骂”，不正是上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的写照吗？195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8册《胡适思想批判》，将胡适描画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中华民族的罪人”，连他的儿子胡思杜都登报指责，胡适是“人民的公敌”。^①1954年，周扬更为胡适思想批判定调，说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②胡适五十年代在纽约的那段日子可以用“穷愁潦倒”概括之，而他在国内的际遇则不出“奇险殊辱”。

而今我们回看19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无非只是一个政权集全国之力，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诬蔑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费尽心机要打倒、铲除胡适的思想，结果却把一个在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先时之人物”了。

这一改变，绝不是胡适思想在那几十年之中，有了飞跃，有了进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适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③胡适四十岁之后，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论的提出。然而胡适由20世纪初期“应时之人物”，到80年代反而成了“先时之人物”，却又实事俱在，究竟是什么力量延续并光大了胡适思想？

1949年之后，胡适在中国苦心耕耘了30年的自由与民主，在一夜之间，摧毁殆尽。五四以来，多少知识分子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一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铲除的对象。换言之，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封闭与独裁使胡适由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80年代“先时之人物”了。由此推论，不

①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登了一篇由胡思杜具名，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剪报见1950年9月27日至28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

②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胡适手稿》第9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页493～494。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商务，1977），页143。

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封闭与独裁是滋生胡适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适思想始终不过时最好的保证。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有机会和美国、大陆、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美国学生来说，胡适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识（common sense），他们很难理解，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何以竟能震动一时，开启一个新时代。对台湾学生而言，胡适只是一个过气的白话作家和政论家，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论尺度，都不免失之“温吞”，很难激动台湾少年人的心。至于五四时期胡适意气风发的言论，对80后、90后的台湾青年来说，都已是遥远的“中国上古史”。他们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来一句，“这和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美国学生也好，港台的学生也好，胡适，毫无疑问的已是一个过去的人物。

但和中国大陆学生谈胡适，他们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感。读到胡适1919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这几句话：

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①

我相信，只要是经过“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激起深沉而恒久的震撼。“主义”和“革命”这两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②今天回看这几句话，依旧是光焰常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一般都将此文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此以后，“革命”这个在中国风光了几十年的词，渐渐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国人也终于从“主义”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梦魇。胡适毕生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一点一滴渐进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其精义无非就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

①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台北：远东，1968），1集，页372。

② 《胡适文存》，4集，页624。

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的试金石”。^①30年来对胡适思想的打压，铲除，结果竟走回了胡适“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老路。而毛泽东与邓小平之别，也无非只是“主义”与“问题”之争。中国人在受了几十年的蒙蔽之后，猛然醒悟到，原来，改革开放大设计师的思路竟和胡适思想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和鲁迅相比，胡适最幸运的是他始终不曾被偶像化过，始终不曾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毫无保留的赞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三家”——“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②的褒扬，把鲁迅扭曲成了一个为共产主义冲锋陷阵的旗手。鲁迅地下有知，也会哭笑不得。鲁迅自己写过一篇题为《骂杀与捧杀》的短文，^③值得警惕的是被骂的未必被骂杀，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脸肿，失了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人神之间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看来，一个受人顶礼膜拜，而一个受人摆布戏弄，似是两极。但实质上相去是极其有限的。所谓偶像化，无非就是要偶像来为其他目的服务，一旦有了服务的对象，偶像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傀儡了。鲁迅在死前10年，1926年，发表《无花的蔷薇》，就已经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④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这个傀儡化的过程。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说到，“（鲁迅）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⑤真是一针见血！

胡适始终没有被偶像化，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独立自主最好的说明。北大红楼前的五四纪念碑上，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浮雕，而独缺主将胡适。多年来有人倡议在北大为胡适立像，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这种种都说明，胡适至今是个“违碍”。胡适不但没有被偶像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平反”。其实平反不平反，对死者来说，已毫无意义。平反胡适，既不能为他增添什么，也不能为他减少什么；但对当年判他“有罪”的当道来说，平反胡适这样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尊荣，做出过划时代贡献的人物，是可以为当道统治的合法性，加上一个可观的砝码的。

①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1集，页381。

②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1966），第2卷，页658。

③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1981），卷5，页585～586。

④ 《鲁迅全集》，卷3，页256。

⑤ 周作人、曹聚仁：《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第1辑，页49。

过去30年来，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重见天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想起明代吕坤《呻吟语》中的一段话：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①

用政权的力量来迫害知识分子，钳制言论自由，基本上是一种“理”与“势”的斗争。表面上，短时期，“势”往往居于上风，但“理”终将“伸于天下万世”。掌管言论的当道，在禁令下达之前，不妨三复《呻吟语》中的这段话，就能知道“禁毁”的工作是如何的失人心，而又徒劳了。然而这个祖传老法，却依旧在网络的时代进行。

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44卷（最后两卷为著译系年）本的《胡适全集》，是目前胡适著作搜罗最全的总集。除《胡适文存》及有关文史哲的著作外，兼收日记、书信及英文著作，约2000万字。

任何以“全集”名篇的著作，由于时空的转移，人事的更迭，要想尽收一个作者的著作，有实际上的困难。更何况像胡适这样一位著作宏富，写作发表达55年的多产学者，不但交友遍天下，而且中英文同时发表，出版的地点及刊物，遍及中国、北美和欧洲，要想一无遗漏地尽收胡适的著作，有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因此我们不但不在“求全”上责备编者，而且还要指出，《胡适全集》是多年来许多学者共同努力集大成的总合。标志着胡适思想和“胡学”在大陆的再现，也是胡适研究界的一件盛事。

《胡适全集》不能尽收胡适作品，是意料中事，但有意的将违碍文字，剔除在外，而在序言中一字不提。这样的做法，套用一句胡适的话，似有“诬古人，误今人”之嫌。我在翻检完《全集》之后，也不免“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了。改革开放30年了，怎么依旧容不下温和稳健，不涉极端的胡适对共产党的一点批评和建议？

1949年以后，胡适在学术上和文化议题上往往是复述当年旧话，而缺乏创见。唯独在反共这一点上是他晚年的新境界，而《全集》则对这一部分，作了刻意的删削。如1947年发表的《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9年《陈独秀的

^① 《明吕坤呻吟语全集》（台北：正大印书馆，1975），卷1之4，页12。

最后见解序言》、《民主与集权的冲突》，1950年《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等文，在《全集》中都不见踪影。胡适的英文著作也同样难逃“禁毁”的命运，譬如1950年，胡适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1954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旅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的《前言》(Introduction)等等，都未入选。在这两篇文章里，胡适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来说明1949年的这个变局，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和说明。这对认识历史真相，无疑是有利的，然而，这毕竟还是犯了忌讳，被摒于“全集”之外。

所有历代的禁毁、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来自当道对知识思想的恐惧，是枪杆子怕笔杆子。胡适的书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诸国人，这正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不曾过时最好的证明。一种已经过时的言论是无需禁毁的；受到禁毁，正是表示与当前息息相关。《胡适全集》少了反共的文字，就像胡适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所说，“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①

1954年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将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灵乌赋》中的这两句话比作与18世纪Patrick Henry所说“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义，都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言论自由的名言。^②21世纪中国人的一点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如果依旧要靠知识分子不怕死的脊梁来撑，那么，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言论自由上的进步又在哪里？我们不能始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鸣”。范仲淹把“鸣”看成是“人臣”对“人主”的言责，所谓“死谏”是“宁鸣而死”的极致表现，这与其说是争权利，不如说是尽职责。

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武昌对公教人员发表题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说，他痛切地指出：

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

①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50），页25。

②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原刊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收入《胡适全集》，卷22，页777～782。

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①。

这段话，在今天中国大陆十三四亿的人民看来，依旧是切中时弊的。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经济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虚幻，因为个人财产，是和言论自由一样神圣而不可随意剥夺的。若因为思想上的问题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么，经济上的富裕，对这个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今，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为了说两句话，表达一点不同的意见，依旧要用鲜血和头颅来换取，那么，过去30年来，经济上飞跃的进步就只能突显出政治改革上惊人的滞后。

我们希望“宁鸣而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我们争取的是“鸣而不死”。只要有一个人为“鸣”而死，就是中国之耻！

《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0年，在这10年里，我又围绕着胡适，发表了10几万字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现在将这些文字一并收入。有些文字，在10年前，我绝不敢寄望能在大陆发表，这次能和国内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欣慰！

2012年2月25日于普林斯顿大学

^① 《胡适全集》，卷22，页753。

2002 年版原序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不但是提倡者，也是总结成果的人。就学术研究而言；胡适的影响及于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各个层面。甚至于近代中国语法研究，胡适也是少数先驱之一。

就社会改革而言，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从个人主义到“好人政治”，这些口号和运动都是和胡适分不开的。他几乎成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新思潮的总汇；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成果，都或多或少地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胡适成了一个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两极人物。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相信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不相信权威，不相信捷径，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相信“知难行易”的三民主义。他相信“功不唐捐”，努力不会白费；他相信“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在胡适的著作中，虽不乏对中国文化严厉的批评和对西洋文明热烈的赞扬，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胡适一生的工作和努力是和中国前途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将“中国”这个成分从“胡适”这个名词中抽离，“胡适”立即成了一个虚幻。胡适的功也好，过也好，唯有在“中国”这个大前提之下，才有意义。

本书所收是我多年来研究胡适生平思想的部分心得。论文内容基本上可以

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胡适与他并时学者的比较研究，在胡适与鲁迅、冯友兰、赵元任、梁漱溟、钱玄同的比较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两人在思想和个性上的异同，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一些时代思潮的侧影。第二组文字则是就胡适思想作专题探讨，他的文学理论，他对科学与民主的阐释，对政治的态度，以及他早期思想中的爱国，都有专文讨论。这些论文除少数几篇曾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此次结集出版，在文字上作了一定的增删。

2002年5月26日

于普林斯顿大学

目 录

增订版自序：光焰不熄	1
2002年版原序	9
胡适与鲁迅	1
序论：捧鲁与批胡	1
交谊：由合作到分歧	6
从白话文到新诗	15
结语	24
胡适与冯友兰	29
前言	29
中国哲学史	35
历史·传统·西化	47
结语	60
胡适与林语堂	64
前言	64
从白话文到整理国故	68
信仰，宗教与科学	81
政治：热肠与冷眼	86
海外的声望及影响	93
结语：还其本来面目	100

胡适与吴敬恒	105
胡适笔下的吴敬恒	105
评价的改变和提高	107
吴敬恒是个过渡性的人物	117
吴敬恒笔下的胡适	119
胡适何所取于吴敬恒	120
同中有异	123
最后的敬礼	125
胡适与赵元任	127
胡适笔下的赵元任	127
白话文	130
政治·社会·文化	137
婚姻·家庭	141
结语	147
胡适与梁漱溟	148
学术与事功	148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151
异中有同	153
结语	157
胡适与钱玄同	161
序论	161
个性的异同	162
白话文运动	165
文字改革	169
古史考辨	175
胡适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178
前言	178
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182

对孙中山的评价	191
胡适的反共产思想	201
前言	201
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	202
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	207
从思想史上反共产	210
对现实的直接批评	215
结语	222
“以文为史”与“文史兼容”：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	225
前言	225
胡适笔下的传记文学	225
比较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	234
胡适文学理论探源	240
读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的回顾与展望	255
胡适的游记	262
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269
胡适所说的科学	269
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	271
科学与自然	277
为科学寻中国的根	278
结语	283
胡适对民主的阐释	288
前言	288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289
民主在中国的历史基础	292
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	297
结语	301

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	304
前言·····	304
从逻辑到科学·····	306
民主与自由·····	311
妇女问题·····	316
中国在进步·····	321
结论·····	324
冷眼与热肠——胡适对政治的两种态度·····	328
国界与是非——胡适早期思想中的“爱国”·····	341
前言·····	341
《竞业旬报》时期（1906—1910）·····	342
留学时期（1910—1917）·····	347
结语·····	351
超越不了“国界”的“是非”——胡适对中国婚俗的态度·····	354
胡适笔下的日本·····	361
在鄙夷和敬畏之间·····	361
中、日现代化的比较·····	366
日本的民族性·····	369
不念旧恶·····	371
胡适的暗淡岁月·····	375
前言·····	375
葛思德图书馆·····	375
维持学术纪律·····	389
结语·····	393